

贵州古籍集粹

韵学源流注评

贵州人民出版社



韵学源流注评

陈振寰 注评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万寿
黄泳明

封面设计 石俊生

韵学源流注评

陈振寰 注评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222千字

印数1——1,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1-00346-7/H·09 定价: 5.60元

前 言

《韵学源流》传为清莫友芝（1811—1871）所著。友芝字子偲，自号邵亭，又号瞿叟。世居江南上元（江苏江宁县境内），明中叶，远祖莫先随军迁居贵州都匀；高祖莫云衢，又迁居独山。友芝父莫与俦（1763—1841），为清仁宗嘉庆四年（1799）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改官为四川盐源知县，再改官为贵州遵义府学教授。与曾国藩友善。莫与俦是个很喜欢文字训诂之学的人，他“日以朴学倡其徒，教其子弟”（莫与俦墓志），莫友芝刻意追摹父志，“于《苍》《雅》、故训、《六经》、名物制度，靡所不探讨”，旁及金石、目录之学，又留意书法，所作诗文皆有新意，“名冠西南”，一时“朝士贵人争欲与之交”。然而，“屡试礼部不得志”，乃从曾国藩等游于江浙皖一带，并定居南京。虽屡见征诏，均辞谢不就，以布衣终其一生。莫友芝著述很多，据张裕钊《莫子偲墓志铭》，有《黔诗纪略》三十三卷、《遵义府志》四十八卷、《声韵考略》四卷、《过庭碎录》十二卷、《邵亭诗钞》六卷、《榘茧谱注》一卷、《唐本说文木部笺异》一卷，未完稿还有《诗》八卷、《邵亭文》、《影山词》、《邵亭经说》、《古刻钞》、《书画经眼录》、《宋元旧本书经眼录》、《旧本未见书经眼录》、《资治通鉴索隐》、《梁石记》等。这些著述今天大多存世。《墓志》未列《韵学源流》，而所列《声韵考略》又未见传本，罗常培认为“考黎庶昌《莫徵君别传》及张裕钊《莫子偲墓志铭》，均载《声韵考略》四卷，而不及此书，意此书或即《考略》之初稿而展转传钞者耳”。罗氏此说，

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

《韵学源流》的问世，源于遵义赵幼愚的校钞本；民国初年，刘师培（申叔）入蜀，赵幼愚以之赠刘；1918年，康宝忠据刘氏校本刊印，此书始为世人所知。此后，1923年安顺杨恩元印于贵州文通书局，1929年罗常培校本印于广州，1933年吴承仕跋本印于学林丛刊社。特别是罗校本，印行之后，一些音韵学著作加以引用（如王力先生、张世禄先生等），影响很大。1962年，中华书局据罗本重印（章锡琛复校），进一步扩大了此书的影响。

《韵学源流》赵钞本已题为独山莫子偲著，后更经罗氏论证，作者为莫友芝，学界本无异议。1963年山东大学殷孟伦先生发表了《莫友芝与〈韵学源流〉的关系质疑》（见《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后收入《子云乡人类稿》），他仔细核查了《源流》所据材料的来源，认为全书一万九千零四十九字（不计标点。按，各本多有异文，概括地说成二万字即可），十分之九是引用他人文字，其中又主要引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次引自戴震《声韵考》等；又从作者对材料的取舍、作者的关合语言等推论，认为作者音韵知识还停留在乾嘉以前的阶段，且时有矛盾、错误之处。他认为，以莫氏的声望，绝不至于点窜他人著述为己作；以莫氏的为人，绝不敢于增删改窜《提要》；以莫氏的学识见闻，不应对于乾嘉以后韵学研究一无所知，因而怀疑《源流》非莫氏所作，并推想作者是清末一位粗通音韵的学堂先生。殷文发表至今二十多年了，既未受到公开的驳难，也未得到正式的响应，然而，《韵学源流》的作者问题却成为研究、校印《源流》者不能回避的问题了。

可以说殷氏之论其言甚辩，而其据不足；至少缺乏实质性的证据，很难据以定案。

说《源流》多据他人成说（特别是《提要》）缀合而成，很少摭发个人见解，因而必非博学审慎如莫氏者所为，说服力是不强

的。从传世莫氏著作看，他较精于目录考据之学，于音韵学并未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何况莫氏学术的成熟应当有个过程，要他对音韵学史上众多的著述、纷繁的问题都有个人的见的、第一手的材料，是不现实、不可能的。这部书前详后略，匆匆结束，草稿的痕迹很重；直录成说而穿插以总括、过渡性文字，则又很象读书笔记或著作纲要。为什么不能设想这是莫氏有感于当时尚无一部有条理的韵学史，在阅读《音论》、《提要》、《声韵考》等书时，随手摘记，加以整理，草成此篇，终觉不能如意而未加刊布呢？莫氏著作之传于今者，有《独山莫氏邵亭丛书》七种六十六卷（包括《贵州诗纪传之正》、《宋元旧本书经眼录》、《贞定先生遗集》、《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邵亭遗文》、《邵亭诗钞》、《邵亭遗诗》）、《持静斋书目》四卷（另《续增》一卷、《藏书纪要》二卷）、《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十六卷、《樗菴谱》一卷、《影山草堂六种》三十卷，附录三卷、《黔诗纪略》三十三卷，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还藏有莫氏《日记》手迹两种。对照《墓志》和黎庶昌《别传》，莫氏著述绝大多数存世，而独不见他生前即已编定的《声韵考略》，这是很令人费解的。罗氏之论所以为世人首肯，道理或即在此。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例如，《声韵考略》“真本”复出，《韵学源流》“真作者”考明，确证《源流》所论与莫氏其他论述严重抵牾）足以证明《源流》非莫氏所著之前，我们宁肯相信罗先生的意见。

说此书引录材料多出《提要》，音韵观点未超出乾嘉以前，因而推论非莫氏所著，理由更难成立。《源流》论古韵只及顾江，引录文字止于戴震，只能说明作者在音韵方面见闻还不够广，研究还不够深，并不能证明是否莫氏著作。莫氏本不以音韵学名世，终其一生，所经眼书很少当代音韵著作，所交结者绝少当代音韵名家，凭什么推论莫氏一定能熟悉乾嘉以后韵学研究现状，并能加以总结呢？友芝小学知识直接受之于其父莫与俦，莫与俦生活

于乾隆中叶至道光中叶(1763—1841),约与王念孙同时(1744—1832),当其读书时,《四库总目》刚刚编定(1782),戴震虽已名扬天下而钱大昕、段玉裁、孔广森还正当青壮之年;钱氏《十驾斋养新录》(刊于1804)、段氏《说文解字注及六书音韵表》(始刊于1815)、王念孙《高邮王氏遗书》(刊于念孙死后)都是在与傅四五十岁以后,蜗居贵州教习时刊布的,小于莫与俦五十岁,家居皖南,专攻音韵学的江有诰(1812—1851)尚且未能见到这些著作,莫与俦和莫友芝(略长于江有诰)未能亲见并研读之,难道是无法理解的么?再者,莫友芝在学术观点上,并不是一个尚新求奇的人,郑珍《郤亭诗钞序》说:“其读书,谨守大师家法,不少越尺寸。余每举形声、训诂,或一二说异许郑处似之,遽虽无以随诂,意顾不善也。”友人偶以一二新说与之讨论,尚且不以以为然,何况行世未久,大异成说的学术专著,莫氏未及注意或未能接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至于殷先生推测作者可能是清末一位略通音韵的教书先生,更少依据。若因其未引据乾嘉以后著述,则只能推断为乾嘉以前人,如是清末人,却一丝新消息皆无,反而使人奇怪;若因其改窜《提要》文字,《源流》对于《提要》实在已是奉若圭臬的了,即使前后观点矛盾,也照引不改,至于文字省改,作者本未明言引自《提要》某页某节,全作为自家文字处理,又是未刊之草稿,有何妨害呢?若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钦命官修,不能增改一字,嘉庆间浙江巡抚阮元就曾撰写《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并所购《四库》未收书进呈内府,这不明明是公开宣称帝王眼内尚大有漏遗么?至于乾嘉前后,学术界评注古籍,持不同于《提要》观点者大有人在,不必因引述《提要》文字有所删改,就判定《源流》非某时某人所著。

如果认为《源流》颇象学堂讲义,我们倒宁愿设想它也许是莫与俦在遵义府学“日以朴学倡其徒,教其子弟”时的讲义而为

友芝记录整理成篇者。可惜没有证据，只能姑妄言之而已。

殷孟伦先生是我的前辈，私交甚笃，以上所论，也是向殷先生请教之意。为了慎重，我们在注评中一般不直接称作者“莫友芝”、“莫友芝《韵学源流》”，而只称“《源流》作者”、“《韵学源流》”等，这也表示我们认为殷先生的质疑是值得重视、应进一步研究落实的。

作为一部早期的、简明扼要的音韵学史，《韵学源流》对普及音韵知识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罗常培先生在《后序》中说：“韵学之兴，垂一千六百余年，流别所衍，支叶繁滋，源委不明，何以深察条贯，辨章然否？清人推迹韵学沿革之作，前乎莫氏者，有万斯同《声韵源流考》及潘咸《音韵源流》二书（按，明方以智《通雅》‘小学大略’的音韵部分，也具有音韵史性质）。万书匡廓粗具，罅漏弘多；潘书凭臆杜撰，难资典要。莫氏此书，理明事简，弗尚烦纤，博赡或弗逮万，而纠缠缦乱之讥，庶几可免。”又举《源流》论《切韵》以来部居之说，以为“其所致疑，并皆精辟”，评价是很高的。虽然罗先生指为“精辟”的关于《切韵》部居之论并非《源流》创见，所谓若莫氏得见唐写本韵书残卷，则隋唐韵书部次，或不待王国维考证云云未免过誉，但“理明事简，弗尚烦纤”八字评价还是相当中肯的。

我们认为《韵学源流》至少有下列几点是可以肯定的：

它是第一部“理明事简”的汉语音韵学史，正式刊行后七十年间，对普及音韵和音韵学史知识，起了积极的作用；

它最先明确地分古韵研究、今韵研究、反切研究三方面阐述韵学史，对后世音韵学和音韵史的编撰，有一定的影响（《提要》虽分古音、今音、等韵三部分介绍音韵学著作，但那还不是从音韵学史的角度着眼）；

它在不少地方以提炼旧说和综合评点的方式，提出了自己较有价值的见解。例如：①“六书之谐声即韵也”；②清

顾、江之后的古韵研究“虽更小有密于二家，亦其支流而已”；③“岂《广韵》二百六韵之目，即法言旧部欤？法言《序》既举支脂先仙等为说，则分部又必不自法言，岂自《声类》即已有此等部，而四声既兴，又以四声界之耶？法言又云，诸家有乖互，岂合诸家之部分而去取整齐之耶？”；④据《广韵》恭字注，谓“亦可见字有移附，岂部分独无移并欤？”又据《唐韵序》谓“《广韵》所占地名、人名、姓氏之繁，当悉本之《尔雅》”；⑤据“光《传家集》中，下至《投壶新格》之类，无不具载，不知何以不载此书”，而怀疑《切韵指掌图》非司马光所著。种种推断，都是很有眼光很有见地的。

这些我们在评说部分都已一一论及，不赘述。我们在评说中也指出了它的许多明显的弱点，缺点，以至谬误之处，比较重要的象：

作者对音韵学史上许多重要问题不了解，不明确，或有意忽略不谈；对所涉及的多数音韵学家和多数著述，均未进行过研究，相当多数著述，作者并未亲见，只凭《提要》、《声韵考》、《音论》等著作提供的第二手、第三手材料予以评述，经常是照钞成文，且时有删节改窜。这就大大降低了《源流》的学术价值。《提要》非一人之作，本身已有前后抵牾之处，《源流》更杂采众说，时加点窜，于是前后矛盾、重复的问题势所难免。

《源流》论古韵，以《诗经》用韵为中心；论今韵，以“历代诗家承用之谱”为中心；论等韵，以反切、三十六字母为中心。它立足于声韵之用于诗文，对韵学理论、声韵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规律不重视，不理解，对反映实际语音因而偏离传统韵书的著作、观点采取漠视、排斥态度，这就使它自觉地框限了视野，以致不可能成为一部全面的、完善的、

更为科学的音韵学史。

由于上述两点，使它论古韵只至顾江，论今韵不及《中原音韵》等北音韵书，论等韵上不及《韵镜》、《七音略》，下不论明清许多重要韵图。它介绍顾江古音学，不能涉及研究方法和具体贡献；介绍《切韵》、《唐韵》、《广韵》或径钞序文，或略述版本体例，而不及声韵体系；而对于象《韵海镜源》这类已佚的类书和并无突出价值的杨慎古音杂著，却不惜篇幅，大着笔墨，详加介绍。

这些缺点都是严重的，然而，我们如果考虑到它是一百多年以前，现代科学的语言理论尚未传入我国时，一位并不十分精通音韵学的人，主要依据文献资料所草成的著作，或许能够给以谅解吧？

《韵学源流》现存的钞本和几种印本，各有讹误衍阙，即使罗常培先生的校点本，文字和标点的疏误也不止一二处。我们以罗校作为底本，参校了其它存本，并认真核对了《源流》所引用、钞录的各书的原文，更进一步仔细核查了《源流》经常钞录的《提要》、《音论》、《声韵考》等书所征引的古籍古著的第一手材料，力求改正罗本文字、标点错误，凡重要的改正（如“今考《周礼·甸祝》‘禴牲禴马’亦如之”误为“今考《周礼》‘甸祝禴牲禴马亦如之’”；“晋世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误为“晋世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幸不讥繁，于时天宝十载”误为“幸不讥繁于时，天宝十载”；“亦资闻见，无益经典”误为“亦资闻见，无异经典”等）都在注释中作了说明。

《韵学源流》向无注本，作为一部音韵学史，它所涉及的人、书、事，专业词语是很多的，初步统计，它提到的各类人物有二百五十一人，各类书籍二百九十六种，术语一百一十二个。我们这本书是以初通韵学者为主要对象的，对这些人、书、词不能不一一诠释，考虑到体例的统一，有的人、书、词语虽较为常

见，也不能不略加注释。象《韵学源流》这类书，内容并不算艰深，但引例涉事往往却比较偏僻，有时为了查实一人一事，需花费一两天时间；对它提到的某些书籍，注释不过二三百字，却总得找到原书翻看一过，写来才心安理得。其中甘苦，注者自知。尤其不巧的是，工作进行当中，北京图书馆闭馆搬迁，暂停借阅，其他单位图书馆则很难特别照顾非本单位的读者，使评注者时时如立旷野，茫然无所措手足，有些注释便不得不利用第二、三手材料，其不可强解者，只好付诸阙如，待将来有机会时补正。这一点还要请读者谅解。

我们的评语并无一定的体例，或析评原作，或正谬补遗，或借题发挥，想说什么便说什么，并不限于对《韵学源流》本身的评议。当然，借题发挥也得有题可借，《源流》本无某题者，我们便想发挥也不能了。我们对《源流》具体观点或材料的评论，也常常放到相关的注释中去说，评中不再重复，这是必须提请对我们的评语有兴趣的读者注意的。

本书从定题到完稿，始终得到贵州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和帮助，个别问题曾跟唐作藩、杨耐思先生讨论过，如果它对音韵爱好者和研究者还有点用处的话，那首先得感谢他们。

陈振寰

1987年10月于北京

书已付排，作者再去复馆后的北图借书，承工作同志细心查找，在索书号与上架书号不一致的情况下，居然找到了《源流》原钞本和罗常培初印本。从钞本的款式、讳字（帝讳止于颢琰）足证《源流》为道光以前作品，殷先生推测作者为清末塾师自难成立，而我们推测作者为莫与俦，或非无稽；又从罗氏初印本可知，解放后印本某些错漏实是章锡琛复校之误。清样已出，除个别重要误漏加以改正外无法一一说明。凡此，容日后另文详述。

振寰 补记 1988年5月

目 录

前言

《韵学源流》注评·····	(1)
---------------	-----

附录

《韵学源流》康宝忠跋·····	(281)
《韵学源流》杨恩元跋·····	(281)
《韵学源流》罗常培一九二九年后序·····	(282)

音韵之道有三^①：曰古韵^②，曰今韵^③，曰反切^④。

【注】

①音韵之道：研究音韵的途径。

②古韵：古音；即通常所谓以《诗经》和先秦韵文为代表的上古音。下文说“古韵者，皆造字之本音也”。

③今韵：今音；即通常所谓以《切韵》、《广韵》为代表的中古音（或“隋唐音”）。下文说“隋唐以来历代诗家承用之谱也”。

④反切：“反切”本为我国古代一种拼读音字的方法——以上下二字拼切一字之音（详下文）；综观后文，知作者实指以反切为核心内容的字母等韵之学。

【评】

这是全书的总纲。这个总纲脱胎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总目》、《提要》或《××提要》）《经部·小学类三·韵书之属》按语，“韵书为小学之一类，而一类之中又自分三类，曰今韵，曰古韵，曰等韵也。本各自一家之学，至金而等韵合于今韵，至南宋而古韵亦合于今韵，至国朝而等韵又合于古韵，三类遂相牵而不能分。”《总目》编者把“韵书”（实际上就是指传统音韵学研究的成果）明确地分为“古韵、今韵、等韵”三类，是一个重要贡献，后世音韵学家讲音韵和音韵史大多数都是沿着这条路子走的。《源流》作者袭用了《总目》按语的三分说，而作了两点改动，一是改“韵书……又自分三类”为“音韵之道有三”，一是改“等韵”为“反切”。前一点是比较重要的改动，也可以说是一个发展。说韵书分古韵、今韵、等韵三类，犹如说小学类书籍分为字书、训诂、韵书三类（见《总目·小学类序》）一样，只是对音韵学研究成果的类分，而说“音韵之道有三”，就涉及到从哪几个方面、角度、路子研究音韵的问题了。《源流》作者虽然未见得如此明确，但也不能说是无意的改动。后一点改动虽然受到后人的非议，认为以“反切”和“古韵”、“今

韵”对立是不合理的，然而等韵学本来就被前人认为是研究反切的学问，既然《源流》作者改《总目》对韵书的分类为对音韵研究路子的分类，那么改“等韵”（犹如说“等韵学”）为等韵研究的对象“反切”，而跟古韵学研究的对象“古韵”、今韵学研究的对象“今韵”并立为三，不是很恰切的吗？

至于宋元等韵研究的性质究竟如何，倒底是对《切韵》系韵书反切纯客观的分析图解，还是为了掌握韵书反切而将它们分析纳入自己时代的语音框架之中（其框架就反映了当时的语音结构面貌）呢？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是主张后者的（参见拙著《音韵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以我们的认识而论，把古音学、今音学、等韵学（或反切学）作为音韵学并立的三个门类当然是有缺欠的，但三分说既非《源流》作者所创立，又相沿至今天，便不应专门批评他了。

古韵者，皆造字之本音也。

【评】

这是古韵部分的总起。《源流》作者把先秦经传所反映出来的古音系统认为就是造字时的本来读音，这当然是不正确的看法。

《源流》古韵部分谈到的古韵学家，起自宋朝的吴棫，终于清朝的江永；涉及的古音材料，上不过《易》、《诗》，距“造字之初”还差得很远呢！

先秦音系就其整体来说，决不能代表“造字之本音”。汉字的产生和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已知最早的汉字是距今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刻划文字和大汶口文化象形文字；最早成体系的汉字是三千多年前殷商的甲骨文。甲骨文曾经经过殷商卜人的整理，但其中大量的同义异形字，告诉人们它们显然不是共域共时的产物。即使我们有一天可以从甲骨文材料总结出可靠的语音系统，也不能说这系统就是“造字之本音”，何

况晚于它几百年，内部时间跨度和地区跨度都极大的先秦经传？

古无韵书^①，亦无“韻”（韵）字^②。“韻”字始见于晋陆机《文赋》^③：“采千载之遗韻^④。”徐铉《说文新附》^⑤：“韻，和也。从音，员声^⑥。裴光远云：‘古与均同^⑦。’未知其审^⑧。”按，秦汉以上，言“音”不言“韵”。《诗序》^⑨曰：“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⑩。”《笺》^⑪云：“声为宫商角徵羽也^⑫。声成文者，宫商上下相应^⑬。”是此所谓音，即今之所谓韵^⑭。魏李登著书，尚名《声类》^⑮，晋吕静仿其法，始名《韵集》^⑯。亦“韵”字出于晋之一证。盖古唯用“均”^⑰。《文选》成公绥《啸赋》^⑱：“音均不恒，曲无定制^⑲。”李善注^⑳：“均，古韵字^㉑。”引《鹖冠子》^㉒曰：“五声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㉓。”裴说当本于此。而刘勰有“魏武论赋，嫌于积韵”之语^㉔，又似建安黄初即有此字^㉕。殆勰引魏武语用今字耳^㉖。（《晋书·律历志》^㉗云：“凡音声之体，务在和韵，益则加倍，损则减半^㉘。”“和韵”即“和均”也^㉙。《宋书·律历志》^㉚云：“后汉至魏，尺度渐长于古四分有馀。杜夔依为律吕，故致失韵^㉛。”失韵即失均也。杨慎^㉜曰：“李善注傅毅《舞赋》^㉝，繁钦《与魏文帝笺》^㉞，并引《乐汁图徵》^㉟曰：“圣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者，六律调五声之均也^㊱。”晋灼《子虚赋注》^㊲曰：“文章假借，可以叶韵^㊳。”《唐书·杨收传》^㊴曰：“夫旋宫以七声为均——均，言韵

也，犹言一韵一声也④。”）④

【注】

①古无韵书，韵书是一种按韵归类编成的同音字典。已知的中国最早的韵书产生于魏晋时期，有史可查的第一部韵书是魏李登的《声类》。书已失传。据唐封演《闻见记》载：“魏时有李登者，撰《声类》十卷，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这里所谓“古无韵书”就是指汉魏以前没有韵书。

②亦无“韻”字：也没有“韻”（今简化为“韵”）这个字。《说文解字》卷三上“音”部仅有“音（声也）、响（声也）、籥（下彻声）、韶（虞舜乐也）、章（乐竟为一章）、竟（乐曲尽）”六字，已发现的甲金文和先秦典籍均无“韻”字。

③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西晋著名文学家，文学批评家。出身世族，祖陆逊、父陆抗皆为三国吴名将。陆机少年时曾任吴牙门将，吴亡，十年不仕，家居苦读。晋武帝太康末，与弟陆云同至洛阳，以文才倾动一时，世称二陆。历任晋太子洗马、著作郎、中书郎。成都王司马颖举荐他为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晋惠帝太安年间，以后将军、河北大都督衔为成都王讨伐长沙王司马义，兵败，被谗，为颖所杀。有诗百余首存世，也善做骈文，词藻华丽，后人辑有《陆士衡集》。《文赋》是陆机名著，为我国古典文论的重要作品。

④采千载之遗韻：《文赋》说：“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韻。”意思是，收集百代中缺疑的文字，采集千年来散失的文章。这里的“韻”，是“文章”的意思。“韵”本指和谐、风采气度，作文必求神韵与和谐，陆机为求骈偶，以“韻”字与上句“文”字对言，“韻”便有了文章的含义。

⑤徐铉（916—991），字鼎臣，扬州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人。初仕五代南唐，后归宋，官至散骑常侍。与弟徐锴都是著名的文字学家，史称“大小二徐”。曾校订《说文解字》，增补正文十九字，增附经典承用或时俗通用，而为《说文》所未收字四百零二个。所增附字都放在各部末尾，并注明“新附”字样，这里所谓《说文新附》即指此。

⑥韻，和也：韻是和谐、协调的意思。这里所谓“和”，特别指音乐的声调旋律和谐。《说文解字》口部“和，相应也”。龠部“龠，调也”。甲金文和、龠本通用，都是乐律调协的意思；“龠”，甲文象口吹排箫，禾是声符，“和”是“龠”的简化。从音，员声；韻为形声字，音为形符（义符），

员为声符；《说文》分析形声字的通常格式是“从×，×声”。《类篇》韻、韵异体同见。

⑦裴光远：未详。古与均同；“韻”古与“均”字同用。均，本义“无所不平”，《说文》土部：“均，平遍也。”引申为均匀、协调。均用于音乐，指有固定音高的一组音（音阶）。即，以十二律任何一律为基本音建立起来的一个五声或七声音阶叫做一均。又指声音、语言，后另造“韻”字。借入语言学中，用为声韵之韵。

⑧审：详情、依据。按，罗本断句作“裴光远云：古与均同，未知其审。”是将“未知其审”误作裴光远语。不当。“未知其审”意为“不知裴说的依据是什么”。应为徐铉按语。

⑨《诗序》：《毛诗序》的简称。秦焚《诗》、《书》，汉初，传《诗》者有鲁（申培）、齐（轅固）、韩（韩婴）、毛（毛亨、毛萇）四家。魏晋以后，《毛诗》通行，影响最大。《毛诗》于各篇诗前有题解，人称“小序”；首篇《关雎》，于题解后，又有长篇文字，概论《诗》全书精神，人称“大序”。郑玄笺注《毛诗》，以《大序》为子夏所作，“小序”为子夏、毛公分作，这个看法未必正确。今多数学者认为《诗序》可能是东汉卫宏所作。

《大序》指出诗与时代政治有密切关系，对后世诗歌创作、文学理论影响巨大，是我国早期最重要的文艺理论著作之一。

⑩“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大意为，“感情抒发到声音，声音交织成文采，称之为‘音’”。《礼记·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⑪《笺》：即《郑笺》，郑玄注《诗》文字。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东汉著名经学家。玄曾入太学学今文经（汉初诸生所传，以隶书记录流传之经籍），又从张恭祖、马融学古文经（汉鲁恭王坏孔子宅壁得经书，以篆文书写，称古文经；后各地陆续有所发现），故经学贯通今文古文。有弟子数百近千人。著《六艺论》、《驳五经异义》等，注《毛诗》、《周易》、《论语》、《尚书》等。

⑫宫商角徵羽：古五声音阶阶名，其音高比大约等于今西方自然大音阶的do（都）、re（来）、mi（米）、so（梭）、la（拉）。

⑬宫商上下相应：五声前后应和。宫商代表五音以至一切乐音。

⑭这里所说的“音”指的是“声成文谓之音”的“音”，即和谐的旋律，而不是一般“声音”、“音响”、“音韵”的“音”，这里所说的“韵”指